

浙江海洋文化研究丛书

浙江古代海洋 *zhejiang* 诗歌研究 *gudai haiyang shige yanjiu*

杨凤琴◎著

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
桃门通山抃，蓬渚降霓裳。
惊涛含蜃阙，骇浪掩晨光。
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

课题成果(编号:11JDHY01YB)

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研究

杨凤琴 著

海洋出版社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研究/杨凤琴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027 - 8883 - 4

I. ①浙… II. ①杨…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3898 号

责任编辑:赵 武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4

字数:240 千字 定价:45.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洋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海洋文学作为海洋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也逐渐受到关注。海洋文学的发展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很丰富，但目前学术界对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却并没有呈现出兴盛的态势，关于古代海洋文学研究的专著寥寥无几，只有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海洋出版社 2009 年）、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海洋出版社 2012 年）等少数专著着力于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在古代海洋文学作品搜集整理上也仅有海洋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中的几部著作，包括李越选注的《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徐波选注的《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以及倪浓水选注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研究古代海洋文学的论文也很少，赵君尧有《先秦海洋文学时代特征探微》（《职大学报》2008 年第 2 期）、《论隋唐海洋文学》（《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谈唐代岭南海洋文学》（《职大学报》2011 年第 1 期）、《宋元海洋文学的时代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等系列论文，柳和勇《中国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简论》（《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叶冬娜、叶向东《论宋元海洋文学主题取向与艺术特色》（《网络财富》2009 年第 8 期）也对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及特色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与古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海洋文学作品相比显得过于单薄。



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相对萧条的大环境下，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迄今为止没有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专著出版，也鲜有相关论文。浙江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人民的生活与海洋息息相关，无论是自然景物还是人们的生活习俗都具有与内陆不同的特色，这种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诗歌创作中很好的题材，容易激励起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同时滨海有着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这便于文人们从四方汇聚而来欣赏海洋风光，领略海滨风情。浙江本土诗人以及宦居、寓居浙江或来浙游览的诗人创作了数量众多、题材丰富、特色鲜明的海洋诗歌，对这些作品进行搜集、整理和解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浙江古代海洋诗歌是海洋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海洋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作品是浙江古代海洋及与海洋相关的人物和事物的真实而形象的反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浙江古代海洋的风貌以及海滨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可以从中管窥古人的海洋意识和精神世界。

拙作分为五个部分来对浙江古代海洋诗歌进行探究和阐释，第一部分分析了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发展历程，梳理出从先秦到明清浙江海洋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探究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特色。第二部分阐释了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主题类别，详细分析其内容特色。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对海洋景观和海滨人民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同时海洋也是表现忠贞的爱国情怀的载体，而海边送别的场景在海洋诗歌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第三部分论述了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艺术特色，从独特的神话意象、意境特色以及艺术手法三方面着手，探究了海洋诗歌在艺术上的独特性。第四部分挖掘了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价值，海洋意象与某些佛理有精神层面的相通性，因而高僧在阐释佛理时常以海为喻。并且浙江一带很多佛寺

建在海滨的山中，僧人的生活环境与海洋邻近，因而很多诗僧的作品中涉及海洋，或以海为喻，或对海洋景观进行描摹。第五部分论述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在思想上对当今人们的启示，海洋诗歌中表现出古人对海洋复杂的思想情感，其中最鲜明的思想体现在对海的敬畏、探索以及征服三方面。海洋以它的博大和深邃慑服了人们的心灵，同时也吸引着人们对其奥秘进行不懈的探索，并在适当的时机展现出征服海洋的勇气。这三方面思想也应是当代人们面对海洋的态度，因为无论经济和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们对海洋依然要存有敬畏之心，不能任性而为，而对海洋的探索和征服也是永无止境的。

笔者通过对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研读，体会到海洋在古人的心目中有着陆地上其他风景无法替代的地位，古人对海洋的欣赏和描写既展现出精神层面的共鸣，也有客观如实的反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海洋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是一个净化心灵、寄托情怀的领域，它既可以排解由仕途羁绊和人生困顿所带来的烦恼和苦闷，也能够寄托诗人调适自我心态之后表现出的洒脱和豪情。如谢灵运认为观海可以慰藉他的心灵，“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谢灵运《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诗》），羁旅之愁可以通过在晨风中观海来化解。王守仁则写出了自己航海时的洒脱和轻盈：“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天下风”（王守仁《泛海》），静夜中扬帆飞驰在海面之上，诗人体会到了神仙般的洒脱。

其二，古人观察和描写海洋的角度是比较客观的，既有对海洋热情洋溢的赞美，也发现了海洋给人带来困惑的一面。徐凝在观潮时感慨：“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徐凝《观浙江涛》），终其一生观潮尚且不足，可见钱塘潮的确能带给人非凡的审美感受。苏轼对壮观的海景也不吝赞美之词：“横风吹雨



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苏轼《望海楼晚景》）。但客观地说，海洋不只是能给人带来视觉愉悦和心灵放松，它在怒涛翻滚之时充满了不可预期的风险，戴良乘船渡海时就发出了无奈的感慨：“惊看水色连天色，厌听风声杂浪声”（戴良《渡海》），海水浩淼无垠，不知何时到岸，日夜响在耳边的风浪之声使人厌倦。谢景初则描写了海边湿气蒸腾的恶劣环境：“泽卤杂山云，蓊郁相薰蒸”（谢景初《观余姚海氛》），海滨地势低洼，云笼雾绕，使人有一种湿热熏蒸的感受。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对海洋的描写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对海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感受。

其三，从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海洋意识，他们不仅仅将海洋作为风景来观赏，也不只是利用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海鲜资源，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海洋是一个值得敬畏，也需要探求和征服的领域。海洋惊涛骇浪产生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人们只能适时躲避，杨万里诗中写到：“行人莫近岸边行，便恐波头打倒人”（杨万里《海岸七里沙》）。而这滔天巨浪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古人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探究，范仲淹云：“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范仲淹《和运使舍人观潮》）。虽然海洋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但这不能打压和磨灭人们征服海洋的勇气，陆游诗云：“醉斩长鲸倚天剑，笑凌骇浪济川舟”（陆游《泛三江海浦》），持剑斩杀长鲸，乘舟凌驾于骇浪之上，正是有了这种气魄，人们才能进一步认识和利用海洋，让海洋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有利于人类的一面。

海洋是一片神奇的水域，它既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直接联系，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但同时也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危机。从古人描写海洋的诗歌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海洋的风采和面貌，更能体会到海洋对古代诗人精神世界的陶冶和

激励。

因笔者水平有限，拙作在对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研究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作品搜集整理上存在一些局限，在对诗歌的探究上也有肤浅和疏漏之处。笔者对这些缺憾和不足深表歉意，也期待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目 次

第一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发展历程	(1)
第一节 先秦至隋代浙江海洋诗歌的发展	(2)
第二节 唐宋时期浙江海洋诗歌的繁荣	(12)
第三节 元明清时期浙江海洋诗歌的鼎盛	(19)
第二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主题类别	(27)
第一节 海洋景观	(27)
第二节 海滨生活	(60)
第三节 海与忠魂	(96)
第四节 海与别情	(110)
第三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艺术风貌	(116)
第一节 海洋诗歌独特的神话意象	(116)
第二节 海洋诗歌的意境特色	(127)
第三节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艺术手法	(155)
第四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价值	(167)
第一节 与海洋相关的佛教神灵与佛教思想	(167)
第二节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与僧人	(170)
第三节 海洋诗歌与佛寺	(177)
第五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的现代意义	(180)
第一节 对海的敬畏	(180)
第二节 对海的探求	(192)
第三节 对海的征服	(198)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2)

古代浙江本土诗人及寓居在浙江的诗人创作了许多关于海洋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既是浙江古代诗歌中的精华，也是浙江海洋文化中的明珠，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海洋对人类有着神秘的吸引力，它一望无际的蔚蓝水域给人带来无穷的审美愉悦，它的惊涛骇浪令人畏惧又崇敬，畏惧的是它无穷的破坏力，崇敬的则是它的无法想像的巨大力量，因而产生了大量描写海洋景观的作品。海滨人民的生活也成为文人们关注的对象，海洋诗歌中既展现了海滨生活融于自然、闲适美好的一面，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海滨人民为了生计而付出的艰辛和受到的磨难。除了题材的丰富和饱满，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也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体现出深刻的思想价值。

海的广阔和深邃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启迪，汉人刘熙《释名》解释：“海，晦也。”许慎《说文解字》云：“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海是幽隐而深邃的，使人难以明察；海又是博大而宽容的，容纳百川而不自满。《列子·汤问》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老子认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海洋虽然无比博大，但虚心而宽容，善纳百川，因而聚积了无穷的力量。海洋的这些特质对文人有很大的触动，宋代诗人徐玑《题林氏学海楼》中有：“长江欲趋海，日夜不肯休。终然至海后，大小同一流。君家学海名，旧着江上楼。取义诚在斯，终始志欲侔。”“学海楼”，顾名思义，有学习海的精神品性之意，将海洋精神引入到现实生活中来，以培养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境界。钱穆认为：“中国人生彻头彻尾乃人本位，亦即人性本位之一种艺术与道德。”^①自然万物都能对人产生一种哲理上的启示，海洋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产生积极向上的联想。

第一章 浙江古代海洋诗歌发展历程

浙江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人们的生产生活与海洋关系密切。浙江也有

^① 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622页。



着悠久的文明史，考古学家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长江中下游的浙江很早就生活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如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余杭“良渚文化”等。有资料表明：“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① 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古越人与海洋的密切关系。

许多史料记录了古越人的历史，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了最早来到浙江的中原人：“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而奉守禹之祀。”《国语·越语》则记载了春秋时期越国强大的版图：“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远百里。”其中“句无”是今浙江诸暨一带，“御儿”是浙江嘉兴一带，“鄞”指宁波一带，“姑蔑”指湖州一带，由此可见，浙江海洋文明的发展源远流长。

第一节 先秦至隋代浙江海洋诗歌的发展

先秦至隋代是浙江古代海洋诗歌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相关作品并不十分丰富，但这一阶段却为后世海洋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先秦两汉时期浙江海洋诗歌作品寥寥无几，但秦皇汉武派方士到海上寻仙的历史活动为后世诗人海洋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启发了人们对海外世界的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洋已经成为一些浙江诗人关注与集中描写的对象，在谢灵运、鲍照、沈约等诗人的笔下，海洋诗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先秦时期海洋诗歌的萌芽

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一些海洋诗歌作品，如《诗经·商颂·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閟宫》中有：“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说明了中原地区对海滨的辐射力。《艺文类聚》引《周书》载：“周成王时，于越献舟”，有研究者认为：“越人造船

^① 史式、黄大受：《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文史杂志》1999年第2期，第76页。

历史悠久，技艺高超，所谓献舟，实际上献了宝贵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这对周人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当有重大推动。”^① 越人有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舟船使用技巧，这与濒海环境直接相关，《淮南子·齐俗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越地传》也记载越王勾践之言：“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太平御览》引《慎子》载：“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② 这些资料都说明舟船对沿海人民生活的重要性。越人能够造出规模宏大的船只，《太平御览》卷引《越绝书》对当时战船的记载，舟师中的大翼“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③ 如此宏伟的战船在先秦时代被打造出来可谓奇迹，这也说明人们对海洋的利用已经有所发展了。杨国桢认为：“海洋开发活动，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便开始了。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是人类对海洋的早期认识，而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则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社会文明的成果。”^④ 利用海上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行越海贸易也是人们利用海洋的一大方式，而且这一活动也在很早就产生了。战国秦汉时期，已经有了越海贸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在灭吴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资累巨万”。《汉书·东夷传》有关于绍兴的记载：“其上人民，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州者。”海上航行的发展是海洋诗歌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先秦时期与浙江相关的关于江海的诗歌寥寥无几，所以浙江海洋诗歌只是处于萌芽阶段。著名的先秦民歌《越人歌》中有：“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这是越女在水上舟中向王子的表白。《乌鵲歌》是一首早期涉及钱塘江的作品：

仰飞鸟兮乌鵲，凌玄虚兮号翩翩。

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

据《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於吴，群臣皆送

① 姚楠、陈佳荣、丘进：《七海扬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页。

②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至浙江之上。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鹄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这首诗描写了浙江边送别的场景，“浙江”即钱塘江，有研究者认为：“浙者折也，盖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认为它是依据农历八月十八海潮而命名。^①诗中写了越王夫人在江边送别越王勾践及大臣文种、范蠡等人时的悲伤心情。钱塘江上空一片苍茫，乌鸢在翩翩飞舞，忽而聚集在洲渚之上，啄食水中的虾类，这种场景形成了一种忧郁的气氛，不禁使人联想起弱肉强食的无奈。越王夫人有感于越国君臣的命运而“据船哭”。这是一首较早的对钱塘江景物特色进行描写的诗歌。与此诗类似的还有《河梁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
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
阵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
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
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河无梁。

《吴越春秋》载：“句践已灭吴，乃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於周。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逆自引咎。越乃还车，军人悦乐，遂作河梁之《诗》。”这首诗描写了越人渡河攻秦的场景，虽然所渡之水并非浙江，而是“北渡江淮”，但渡水之人是越兵，这也是一首先秦时期与越人相关的江海诗歌。

二、秦汉时期历史事件对海洋诗歌创作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浙江海洋诗歌作品本身很少，这与当时越地文学艺术整体衰落有关。有研究者认为：“越地的史前原始艺术原本十分光辉灿烂，但有史以来，越地由于生存环境的突变，生产力水平的相对滞后，文艺人才也势单力薄，较之中原的文学集团和文艺创作盛况，越地的文艺创作显得有点沉寂，这种情况到东汉以后才有所改变。”^②虽然先秦两汉时期越人守望着海洋却没有留下多少令人欣喜的海洋诗歌作品，但这一历史时期对

① 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 高利华、邹贤尧、渠晓云：《越文学艺术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海洋诗歌的发展起了蓄势的作用。

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传说激励了后世诗人对海洋的关注，如秦皇汉武派人渡海求仙的行为对后世海洋诗歌的创作就有很大影响。秦始皇曾派人入海求仙，《宁波府志》记载：“秦始皇东行郡县，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徐市（福）上书言，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仙人所居，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发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始皇至鄞三十日。”鄞，即鄞县，《鄞县輿地记》载：“邑中以其海中物产，方山下贸易，因名鄞县。”据延祐《四明志》、宝庆《慈溪县志》记载，徐福是从慈溪县城东三十公里的大蓬山入海的，大蓬山又名达蓬山，山上至今犹存秦渡庵画像石刻。《明州香山寺志序》说：“此山东临海，故多海市，相传始皇驻蹕于此，以其可达蓬山，故又称为达蓬山。”黄宗羲《达蓬纪游》描写了游达蓬山的感受：“东尽观沧海，往事一慨然。浪中鼓万叠，鲸背血千年。何物秦始皇，于此求神仙。”唐代诗人李商隐也以此事入诗，如《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讽刺了秦始皇求仙的虚妄。

关于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女入海寻仙药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有记载：“（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从记载来看徐福曾两次入海，可见秦始皇求仙之迫切。诗仙李白《古风》对此事进行了讽刺：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鬟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秦始皇费尽心机派人入东海寻求不死之药，但徐福载着童男童女一去不返，秦王长生不老的幻想破灭，结局只能是“金棺葬寒灰”了。李白的另一首作品《杂诗》也与这一主题相关：“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



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从李白以上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神仙长生之想也是充满了矛盾的，他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能永驻于世，包括人类，但还是对蓬莱仙山的传说很是向往。相传蓬莱山有玉树生出的绿叶，食之可留住玄发红颜，长生不老，诗人对这一神奇的仙境表达了向往之情。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有着极大的神秘感，因而也萌生出丰富的想像，除了以上提到的关于秦始皇的资料外，《史记·封禅书》中还有记载：

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贵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可见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抱以极大的幻想，认为海中居住着仙人，三神山上生长着长生不死之药。先秦时期濒海之国齐国几位君主就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派人入海求仙，及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千方百计地致力于求取仙药之事，虽然最终无果，但这些君主们至死都坚信海中仙山上有神仙和仙药。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进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言，“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可见汉武帝也将长生不老的希望寄托于海上仙山。白居易《海漫漫》一诗即涉及这样的背景：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

云涛烟海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

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
 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
 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
 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傭女舟中老。
 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
 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
 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诗中写到茫茫的大海无底无边，传说海中仙山有能够使人羽化成仙的不死药，秦皇汉武为求仙药多次派方士入海，但仙山依然渺无踪迹，长生不老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梦幻罢了。元代浙江浦江诗人吴莱《大佛寺问秦皇系缆石》中也写道：“手抚一片石，昔为沧海漚。始皇或系缆，万里浩无津。世间本妖妄，何处有仙真？蓬莱不可到，弱水空飘轮。徐生忽以去，方士先避秦。童男继童女，五谷杂货珍。”诗的结尾“我恐石有语，神仙多误人！”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执着于海中寻仙，大费周章一无所获，因而诗人有“神仙多误认”的感慨。明代诗人钟晓《观海》也是这一题材的作品：

官官东南无际天，秦时男女汉时船。
 已疑徐福非方士，复讶孙恩是水仙。
 运石漫劳随弱羽，驱山须待借长鞭。
 何人汗漫乘风去，花发莺啼不记年。

在东南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秦汉时期的寻仙船只曾经从这里驶过，但究竟哪里有神仙，又有何人乘风仙去了呢？

可见先秦两汉时期虽然浙江海洋诗歌作品寥寥无几，但秦皇汉武派方士出海寻仙药的传说却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许多海洋诗歌作品是以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有研究者对秦始皇迷恋于航海这一行为有进一步的探究：“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秦始皇的4次东行巡海是为了寻求海上神仙和长生不老的仙药，以满足其世代当皇帝的骄纵心态。但实际上，秦始皇这种大规模的巡海活动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东行巡海活动实质上



体现的是中原君主对海疆和海洋问题的关注情怀。”^① 统一封建帝国君主对海洋的关注无疑会提高文人对这一自然景观的重视程度，在这一点上也会促进海洋诗歌的发展。

三、魏晋六朝时期海洋诗歌的发展

魏晋六朝时期浙江海洋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与自然环境的改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随着水土治理，越地由‘荒服之地’向‘鱼米之乡’过渡成为可能，原来的沼泽连绵、土地斥卤的穷乡僻壤，逐渐改造成为河湖交错、良田沃衍的富庶之地。晋室南渡之后，越地文艺厚积薄发，得到了凤凰涅槃般的新生。”^② 自然条件的好转使越地成为宜居之地，加之西晋末年，北方出现大混乱，随着晋室南迁，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浙江人口猛增。东晋南朝时期，浙江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这个时期浙江的农业已经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浙江在经济上的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③ 经济的繁盛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永嘉南渡后江东的文化面貌：“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尤其从东晋开始，浙江山水受到士人的极大关注，《晋书·王羲之传》写王羲之归隐之后与东土士人极尽山水之乐，“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乱世纷争中山水风景是士人们心灵的避难所，而且山水的闲适宁静或雄伟壮丽都能陶冶人的性情，使人心胸豁达，淡看名利。东晋名士戴逵曰：“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剔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况物莫不以适者为得，以足为至。”^④ 认为隐居山林者不仅仅是为逃避现实纷争，也可以在寄情山水中得到自适和自足。《世说新语·赏誉》也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文人避难江南，乱世之中山水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

① 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② 高利华、邹贤尧、渠晓云：《越文学艺术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③ 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④ （东晋）戴逵《闲游赞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0页。